

# 19 世纪英国民间慈善活动探析\*

郭家宏

---

**内容提要** 19 世纪,英国民间慈善事业得到飞速发展,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规模和范围均达到相当大的规模。19 世纪中期,慈善组织收到的善款甚至超过了国家在济贫方面总的费用,从而发挥着政府和企业所发挥不了的积极作用。在英国逐渐形成的以私人慈善、工人的自助互助和政府救济为主要形式的多元救助体系,对于稳定社会秩序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同时,这种体系作为英国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在英国福利国家形成前的巨大作用更是不可忽视的。

**关键词** 英国 民间慈善 社会控制

---

19 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英国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但是由于政府调控不力,英国贫困与贫富差距现象日益加剧。与此同时,民间慈善事业得到飞速发展,而且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着政府和企业所发挥不了的积极作用。

## 19 世纪英国民间慈善活动的范围、规模

英国的慈善事业兴起于中世纪,当时的教会、地方贵族乡绅和一些富人秉持基督教“善功得救”的理念,对无力劳动或遭受疾病、灾害等各种原因而陷入贫困的穷人进行施舍资助。到了近代早期,英国制定《济贫法》,旨在把救助老弱病残的式制度化,这也是国家干预社会慈善救济的开始。后来在政府的倡导和支持下,形形色色的民间慈善组织便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不但使英国社会生产力得到飞速发展,财富急剧增加,而且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中突出的就是贫困问题加剧,贫富差距拉大。在旧济贫法体系之下,国家对济贫采取积极态度和适当干预政策。在这一体系下,政府以教区为单位,赋予教区征收济贫税的权力,并以慈善的形式对本教区的贫民进行救济,同时鼓励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

1834 年《济贫法修正案》,即新《济贫法》颁布后,政府确立了“劣等处置”和“济贫院检验”两大原则,将救济穷人转变为惩治穷人。任何想要得到救济的健康的人,必须进入济贫院,把对穷人的救济降到最低限度。1834 年的新《济贫法》一个基本思想是穷人应当自救而不是依赖国家的福利。<sup>1</sup>因而,穷人为了避免沦入济贫院的威胁,不得不做出其他的努力。在这种情况下,私人“慈善

---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9 世纪英国贫困与贫富差距研究”(项目号:07JA770014)成果。

被理所当然地看成是在工人阶级的自助无法应付时应该承担起工人阶级福利的主要责任的承担者”。于是，私人慈善在19世纪中期迅速发展起来，慈善学校、医院、诊所、精神病院、孤儿院、妓女教养所在全国各地纷纷建立。在英国逐渐形成了以私人慈善、自助互助和政府救济为主要形式的多元救助体系，每一个救助主体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群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毫无疑问，19世纪英国慈善事业在英国社会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但是要想准确统计出这一时期慈善捐赠的数量，确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许多街头偶然捐赠给穷人的善款是没有记录的。英国学者切克兰德(O. Checkland)认为：“一些特殊的慈善捐赠有时可以发现，但是作为总体的慈善事业是无法计算出其总量的。”<sup>3</sup> 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从慈善组织构成和发展的目标来推算出19世纪慈善活动的状况。现存的统计资料表明，到19世纪中期，英国建立了大量的慈善组织，慈善活动筹到的善款数量惊人。

据估计，1861年，在伦敦就有不少于640个慈善组织，其中近一半建立于19世纪上半期，144个建立在1850年后的10年时间。仅伦敦市的慈善机构每年的慈善善款收入就超过了250万英镑，这还不包括那些私人个体的慈善捐赠，远远超过了同期济贫法当局在伦敦的济贫投入。<sup>4</sup> 有历史学家甚至宣称，慈善组织收到的善款超过了国家在济贫方面总的费用。<sup>5</sup> 慈善活动资助的范围十分宽广。据霍克斯利(Tomas Hawksly)推算，1869年，在伦敦注册的慈善机构善款总收入估计有530万英镑。其中，63万英镑用于疾病救济，170万英镑用于一般生活救济，170万英镑用于道德、宗教教育方面。而这一年伦敦慈善组织总的开支至少有560万英镑。<sup>6</sup> 1870年，政府用在济贫方面的开支是770万英镑，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期仅伦敦市每年慈善组织募集的善款就在500万到750万英镑之间。这种慈善捐款开支和政府公共救济开支之间巨大的不平衡状况，一直到19世纪末期才有所改善。1899年，国家用在济贫方面的开支是1120万英镑，同期伦敦慈善组织收到的善款只有600万英镑。<sup>7</sup> 尽管二者之间差距缩小，但是这些数据表明，在19世纪英国慈善捐赠数目和国家济贫的开支至少是相同的。

19世纪英国慈善组织的建立也如雨后春笋，发展迅速。根据桑普森(Sampson Low)统计，19世纪60年代初期，在伦敦有640个慈善机构，其中1700年前建立103个，1700-1800年间建立114个，1800-1850年间建立279个，而1850-1861年间则建立了144个。1870年到1872年，增长到700个。<sup>8</sup> 而据霍克斯利估计，60年代末期，伦敦的慈善机构总数达989个。<sup>9</sup> 1869年还出现了全国性的指导机构“慈善组织协会”，这表明分散的个人慈善活动发展到了有组织的集体活动。

与《济贫法修正案》精神相一致的是，19世纪英国慈善事业救济的主要是那些所谓的“值得救助的人”。因而这一时期慈善活动救济的领域，主要集中在医疗、教育、住房、宗教、贫困等方面，并非直接给贫困者生活资料。根据桑普森统计，1860-1861年度在伦敦注册慈善机构的善款总支出中，14.8%用于一般和特殊的医院、诊所；1.9%用于保持生命、健康以及公共道德教育，3.85%用于挽救堕落者，2.65%用于救济街头赤贫流浪者，0.34%用于为针线女和仆人提供住所，3.9%用于救助在学院、医院和救济院、精神病院的老年人，10.89%用于自主贫困儿童教育，6.87%用于救助印度饥民，1.78%用于救助残废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用于宗教方面慈善捐款比例相当大。15.09%用在传教士国内工作，26.06%用在传教士海外传教。<sup>10</sup> 也就是说，只有3%的慈善收入用于救助街头赤贫及特殊原因致贫的人。G.希克斯(G. Hicks)在其1869年的一份报告中对364所伦敦慈善机构进行分析，他发现贫民救济所占的比例并不大。

1868年伦敦慈善机构主要开支用在救助疾病(24.84%)，教育(22.14%)，以及一些职业团体，如英格兰教会成员、军队、以及其他一些信仰成员(20.26%)。这三项加起来达到67.24%。救济穷人衣食的比例较小，详情参见下表。可见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只有那些无法劳动者值得救助，如孤寡老人、儿童、残疾、病人等。体格健壮之人如果要想得到救助，必须进入济贫院，他们在那里要穿上统一制服，统一作息，从事繁重而毫无意义的工作，失去人身自由。因而济贫院被人们称作是“穷人的巴士底狱”。济贫院也遭到了人们普遍的抵制，许多人宁愿在外边挨饿也不愿进入济

贫院。而这一时期的民间慈善活动正好弥补了政府济贫的缺陷。

1868 年伦敦市部分慈善机构概要

类别	支出(英镑)	占总支出比例(%)
疾病	506595	24.84
病后康复	28482	1.4
收容院及避难所	197696	9.69
孤儿	128319	6.29
教育	451772	22.14
自我改善	9871	0.48
宗教派别	24301	1.19
职业团体	413428	20.26
公积金	102395	5.02
救灾	70597	3.46
养老	2595	1.27
一般救助	81086	3.97
总计	2040897	100

资料来源: Bernard Harris, *The Origins of the British Welfare, Social Welfare in England and Wales, 1800-1945*, p. 69.

虽然 19 世纪英国民间慈善机构主要资金并没有用在救济贫民身上,但是在一些地区,慈善机构仍然和济贫法当局一道,做了许多救济贫民的工作。比如 1780 年到 1899 年,布列斯托尔市成立了 40 个“反贫困协会”,1841 年卡莱尔市成立了一个特殊的乞丐协会,来救助被济贫法严格限制在外的穷人。<sup>11</sup>在许多农业地区,如华威郡的泰索村(Village of Tysoe)以及德文郡的科里顿镇(Town of Colyton),长期形成的慈善基金会在救济贫困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sup>12</sup>考文垂市在 1837 年 1 月和 1860 年 4 月组织了两次紧急募捐呼吁。<sup>13</sup>19 世纪 60 年代早期,兰开夏郡在棉花饥荒期间也募集了 150 多万英镑善款。<sup>14</sup>

19 世纪英国慈善活动在救济贫民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对乡村健康医疗机构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据英国学者平克推算,1861 年,有四分之一的乡村医院,五分之一的全国医院的床位是由志愿者管理的。<sup>15</sup>根据洛对伦敦慈善机构的分类,1861 年伦敦慈善机构中,14 个属于治疗医院,66 个属于特殊的医疗机构,39 个属于诊所,12 个属于保持生命、健康以及公共道德教育机构,22 个属于女子医院及感化院,124 个属于老年学院、医院、救济院、精神病院,16 个属于为盲人及聋、哑人服务的慈善机构,1 个是为贫穷的瘫痪者服务,这些机构每年善款收入有 645,072

英镑。<sup>16</sup>另外,慈善组织在小学教育、住房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 19 世纪末期,著名慈善家奥克托利亚(Octavia Hill)建造了 1800 到 1900 套单独的房子,<sup>17</sup> 以及其低廉的价格租给工人。

## 19 世纪英国民间慈善活动的思想与社会根源

19 世纪是英国历史黄金时期,一方面英国因工业革命而使国力大增,成了头号殖民强国,另一方面工业革命引起的贫困与贫富差距问题加剧、疾病流行等社会问题日益严重。与此同时,英国人的贫困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认为个人的穷困或不幸是懒惰的结果,因而政府或社会不应该对贫困的个人进行救济。<sup>18</sup>但 19 世纪英国民间慈善事业仍然得到极大发展,其根源值得深思。

首先,基督教传统思想中关于帮助穷人、“善功得救”的理念,对于 19 世纪英国慈善事业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18 世纪后期福音运动兴起并在 19 世纪产生巨大影响。福音教派强调基督教生活的严肃性以及源于自身经验和信仰的宗教的重要性,强调个人责任和自立的品质。这种思想形成了中产阶级文化的宗教核心,并渗透到工人阶级和贵族思想之中。<sup>19</sup>

福音派认为,现存社会秩序是神定的、不可改变的,富人就是富,穷人就是穷。贫困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事实,穷人应对他们自己的不幸负责,因此,福音派热衷于鼓励穷人自助,反对政府干预。慈善工作意味着个人灵魂得救。唯一神派、贵格派、卫斯理派等教派都积极倡导慈善事业。实际上,福音派运动是跨越教派的运动,慈善工作协会成了福音派、浸礼派、公理会等不同基督教派别聚集的主要场所,各派都强调慈善的重要性,福音教派尤其如此。<sup>20</sup>因而这个运动给 19 世纪对穷人的慈善活动赋予了宗教社团的特征。<sup>21</sup>福音主义者把慈善事业看成是神圣的紧迫的任务,不仅是因为它可以拯救穷人的灵魂,而且也因为真心实意的个人的和自发的捐赠是基督的要求。当时经典的政治经济学家的思想也和福音派结合起来,把提高贫苦劳工道德水准作用放到核心地位。英国学者唐娜(Donna Andrew)认为:“福音主义的元素,政治经济学、马尔萨斯主义和功利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可以通过

慈善同贫困做斗争。”<sup>22</sup>

福音派主张通过发挥宗教道德的力量和鼓励慈善事业的发展来解决社会问题。福音主义者态度的变化与维多利亚中期社会意识的变化关系密切。维多利亚时期,人们已经从“为上帝服务”转变成“为邻里服务”,他们的自我牺牲已经从上帝转向了人类。特别是在19世纪后半期,宗教活动成了社会活动的源头,宗教变成了浸透到社会意识的东西。对改造灵魂的渴求是影响维多利亚时期慈善事业最强大的动力。<sup>23</sup> 维多利亚时期的慈善家们,尤其是福音派教徒,甚至把慈善看成是验证新教自身有别于天主教的领域。对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人来说,慈善协会甚至是国家的骄傲。<sup>24</sup> 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深信慈善作为道德责任和一种改善他人命运的方式的重要性。帮助限于绝望境地以及贫困的个体,如孤儿、扫烟囱儿童、流浪汉、酗酒者、妓女和精神病人等,这种源于宗教观念的动机,是维多利亚时期慈善事业的重要刺激因素。<sup>25</sup>

其次,对于社会革命的真正的、持久的恐惧是19世纪许多英国人之所以愿意大力支持慈善事业的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英国贫困与贫富差距加剧,这必然使社会下层特别是工人阶级对现实产生不满。工人是财富的创造者,但是财富的分配却使他们处于贫困状态,他们意识到不公平的分配使他们受苦,就滋生对社会的反叛情绪,并汇合成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待遇,他们通过集体反抗将这种不满表现出来,由此导致激烈的社会冲突。19世纪初英国激进主义运动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工人受到紧紧的民主思想的影响,他们组织工会,举行签名请愿、游行示威、罢工、甚至起义,反抗经济剥削,争取民主权利。轰轰烈烈的宪章运动,更是显示出了工人阶级强大的力量。哈蒙德夫妇在谈到19世纪20年代的英国史说道:“这个时期的英国史读起来就像一部内战史。”<sup>26</sup>

在19世纪阶级关系紧张的年代,英国中产阶级在捍卫财产具有象征性的姿势,就是他们持续资助慈善事业,因为这可以把工人阶级从绝望的深渊拯救出来。<sup>27</sup> 作为一种防止爆发社会革命的保险伐,资产阶级乐于捐献他们的一部分财产用

来救济穷人。当时英国大多数人相信,穷人的苦难是暂时的,慈善事业可以有效地帮助他们度过困难期。即使在繁荣的维多利亚中期,慈善活动也一直在持续,因为当时社会紧张的局势一直没有消除。正如格莱斯顿说:“请想想,我们必须靠军队、欺骗和良好的愿望统治成千上万双艰辛的手,他们已经疲倦了,正在做出响应。”<sup>28</sup>

最后,有产者所谓的“道德责任”心理和感情因素与社会动机混合,构成了19世纪英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维多利亚时期的慈善家从事慈善活动时,往往怀着一种社会责任。社会福利史学者弗雷泽认为,中产阶级热衷于慈善事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个人的社会需求和心理需求的满足。<sup>29</sup> 19世纪英国的慈善活动常常充满了社会势利行为,大规模的资助被看成可以促进社会前进的行动。而那些出版了的捐赠名单常常极大刺激捐赠者,从而使捐赠数目大大增加。他们对自己的捐赠沾沾自喜,对邻居却一毛不拔。<sup>30</sup>

慈善活动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手段,也是灌输中产阶级价值观念的有效途径。资产阶级还要承担起所谓的改造穷人“道德”的责任,而广泛的走访实践就是一种有效的对工人阶级生活方式进行文化上的进攻。他们认为,慈善活动是工人阶级道德改造的手段,可以培养个人自助的心态,有利于他们摆脱贫困的束缚。<sup>31</sup> 19世纪慈善活动的核心动机之一就是在工人中鼓励自助精神。<sup>32</sup> 都市走访和救济协会(Metropolitan Visiting and Relief Association)章程中明确宣称协会的首要目标是“消除(导致贫穷的)道德因素,鼓励谨慎、勤劳及清洁习惯。”奥克塔维娅·希尔对皇家工人阶级住房委员会说:她与其改善旧的房子,不如改造旧房里的租户。<sup>33</sup> 生活环境调查工作的先驱洛奇(C. S. Loch)很好地表达了这种把慈善作为一种必要的教育手段的思想。他说:“慈善是社会再生器……我们必须用慈善来创造自助的力量。”<sup>34</sup>

### 来自下层的慈善:工人阶级的自助与互助

在19世纪英国的社会保障中,政府提供的苛刻的济贫保障不仅很有限,而且令工人阶级十分怨恨;资产阶级的慈善活动常常重叠低效、不可预测。<sup>35</sup> 在研究19世纪英国慈善事业发展历史的时

候,人们常常忽略了工人阶级为了在贫困状态下为自己及家人所做的努力。实际上,19 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互助与自助在慈善救济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 世纪,尽管英国工人阶级在当时获得可以各种类型的慈善资源,但是,他们最重要的支持与帮助来自于其个人家族的内部,来自于亲朋好友、街坊邻居。曼彻斯特一位教士理查德·帕金森博士(Dr Richard Parkinson)声称:“穷人之间相互给予的要比富人给予多得多。”当地的一名医师也喜欢称:“穷人之间相互捐赠的资金总额远远超过同时期富人的捐赠。”当时工人阶级自传作家特里(Joseph Terry)声称:“穷人比富人更热情、更富同情心,更乐意帮助别人。”<sup>36</sup>在失业、生病、儿童、老年、去世等艰苦时期,绝大多数工人阶级在考虑向济贫或慈善机构求助前,常常先从他们的亲戚或者邻居那里得到帮助。<sup>37</sup>邻居支持网络在贫困人群中获取帮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学者温特(James Winter)估计,在苏格兰的科库德布莱特(Kirkcudbright)的一个渔村,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寡妇母亲的收入来自非正式邻里间资助。实际上,穷人妇女求助邻里是一个传统,这些邻居资助可能提供金钱、食物或者衣服。<sup>38</sup>她们也经常在家庭开支方面互相帮衬,如取暖、照明、洗衣盆、衣服等。她们还一起筹钱来帮助支付诸如葬礼费用、照顾儿童、产妇,为受伤的妇女提供住所等。如果某个人生病或去世,他的同事或者邻居可能会出面组织募捐,用以支付其医药或者丧葬费用,帮助他的妻儿。

19 世纪工人阶级为筹集互助的款项,还建立了一些互助组织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当属友谊会(friendly society),工会(trade unions)和合作社(cooperative society)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友谊会”是 18、19 世纪在工人阶级中广为存在与发展的一种具有直接社会保障功能的民间互助组织。它的成员在自愿捐资的基础上按规定向协会交纳一定数量的会费后,即可在遇到不测(如疾病、失业、年老、死亡、天灾人祸等)时向协会提出救济申请,协会和其他会员有义务为会员提供必要的经济援助。最早的友谊会规模较小,其成员一般局限在当地。1830 年以后,其成员已经突破地域限制,人数急剧增加。1801 年,全国各地友谊会成员总

数为 648000 人,1815 年为 925429 人,1872 年为 2254881 人,1899 年为 7415971 人。<sup>39</sup>虽然友谊会形式各不相同,但其特征是相同的,就是互助、解困。1891 年,各类友谊会的基金总数已经达到 2270 万英镑,1909 年更增至 4820 万英镑。津贴标准因会而异,或逐月支付,或一次性支付。如曼彻斯特联合共济会会员(The Manchester Unity of Odd-fellows)19 世纪中期在生病后的前 12 个月每周津贴为 9 先令,以后每周为 4 先令 6 便士;会员去世时,一次性支付 9 英镑;会员妻子去世,一次支付 4 英镑 10 先令。<sup>40</sup>互助、解困是一般友谊会的首要共同特征,向会员提供某种形式的补助金是协会资金支出中最有意义的一项。

除友谊会之外,早期工会组织也承担工人阶级互助职能。他们常常把自己描绘成友谊会,以规避严格的法律限制。和友谊会一样,会员交纳一定会费后,工会要承担对工人的救济责任。1824 年,将近有 900 名会员的利物浦造船工人协会制订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养老金计划,该计划包括购买土地修建房屋,每周 5 先令的津贴,葬礼津贴为 7 英镑,每一位已故会员的寡妇津贴为 4 英镑。据学者汉森估计,1830 年到 1889 年,14 个工会组织花费了 350 万英镑资金用于资助工人的丧葬、疾病、退休及意外事件。400 万英镑用于失业和罢工补贴。这一时期,尽管许多新工联主义领导人批评老工联领导把太多的精力用于福利救济,但实际上,许多新的领导人也提供类似的福利。<sup>41</sup>

第三种工人互助形式是 17、18 世纪开始出现的消费合作社运动。1826-1835 年间英国建立了 250 多个消费合作社。<sup>42</sup>1844 年,罗奇德尔公平开拓者协会(Rochdale Equitable Pioneers Cooperative Society)创建后,现代消费合作社运动开始飞速发展。合作社建立的初衷是保护自己免受当地商价高质劣的食品的危害,募集足够的资金来建立自己的有共同利益的自我支持的领地。合作社成员每人交纳 1 英镑资金,筹集起来购买商铺。19 世纪末,英国建立了约 1500 个工人消费合作社,会员有 150 万人之多。合作社会员人数在 20 世纪初期仍在持续增长,到 1914 年,合作社会员达到 300 多万人。<sup>43</sup>马丁·普尔维斯表示,到 1901 年,有占总人口 20% 多的人是合作社成员。<sup>44</sup>在纺织

区中,许多并不富裕的家庭将其收入集中起来入股,以在合作社商店中获得定期红利,同时购买到货真价实的、相对便宜的商品,这是合作运动的传播重要原因。实际上,正是由于国家在建立为最贫穷者实行救济的安全网相对缺失,加上接受最低救济的人产生的社会耻辱感,刺激了这种工人自发的福利的增长。但是,消费合作社等福利组织并不能够消除的贫困,而只是些许改善了他们不安全感。

总之,19世纪英国民间慈善事业大发展,除了慈善传统之外,与19世纪英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阶级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慈善事业的发展,弥补了国家在社会救济方面的不足,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了19世纪英国社会控制的一个重要手段。由于这些慈善事业目的是为了救助所谓的“值得救助的人”,因而慈善善款并没有完全发放到最需要的人手里,而工人阶级的自助和互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工人阶级的苦难。尽管如此,19世纪英国慈善事业的在英国福利国家建设之前,具有重要意义。

<sup>1</sup> Peter Murray, *Poverty and Welfare 1815-1950*, second Edition, London: Hodder Murray, 2006, p. 75.

<sup>2</sup> David Owen, *English Philanthropy 1660-1960*,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136.

<sup>3</sup> Olive Checkland, *Philanthropy in Victorian Scotland*, Edinburgh: John Donald, 1980, p. 1.

<sup>4</sup> <sup>25 27 28 30 31 33 44</sup> Derek Fraser, *Evolution of the British Welfare State, A History of Social Policy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73, p. 116, p. 118, p. 117, p. 117, p. 118, p. 119, p. 119, p. 185.

<sup>5</sup> Geoffrey Best, *Mid-Victorian Britain, 1815-1875*,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holson, 1971, p. 138.

<sup>6</sup> <sup>1</sup> Tomas Hawksly, *The Charities of London, and some errors of their administration with suggestions for an improved system of private and official charitable relief*, London: John Churchill and son, 1869. pp.6-7, p. 4.

<sup>7</sup> <sup>19 20 21 32 37</sup> Alan Kild, *State, Society and The Poor in Nineteen-Century England*,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9, p.67. p. 71, p. 73, p. 72. p. 74, p. 111.

<sup>8</sup> <sup>17 35 36 39 42</sup> Bernard Harris, *The Origins of the British Welfare, Social Welfare in England and Wales, 1800-1945*,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 65., p. 133, p. 76, p. 76, p. 82. p. 87.

<sup>9</sup> Sampson Low, *The Charities of London in 1861*, Sampson Low, Son & Co. 1861, pp. vii-xi

<sup>10</sup> Martin Gorsky, *Patterns of Philanthropy, Charity and Society in Nineteenth Century Bristol*, Woodbridg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1999, p. 138.

<sup>11</sup> J. Robin, *From Childhood to Middle Age: Cohort Analysis in Colyton 1815-1863*, Cambridge: Cambridge Group for the History of Popul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1, n. d. pp. 2-3.

<sup>12</sup> Peter. Searby, *The Relief of the Poor in Coventry, 1830-1863*, *Historical Journal*, 20, 2, (1977), pp. 345-361.

<sup>13</sup> W. Henderson, *The Lancashire Cotton Famine 1861-1865*,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34, pp. 68-85.

<sup>14</sup> R. Pinker, *English Hospital Statistics 1861-1938*, London, Heinemann, 1996, p. 57, p. 61.

<sup>15</sup> Sampson Low, *The Charities of London in 1861*, Sampson Low, Son & Co. 1861, pp. vii-xi

<sup>16</sup> 郭家宏:《工业革命与英国贫困观念的变化》,《史学月刊》2009年第3期

<sup>17</sup> Donna Andrew, *Philanthropy and Police; London Chari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69.

<sup>18</sup> <sup>24</sup> Brian Harrison, *Philanthropy and the Victorians, Victorian Study*, Vol. 9, No. 4(Jun., 1966), p. 359., p. 357.

<sup>19</sup> K. Woodroffe, *From Charity to Social Work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2, p. 23.

<sup>20</sup> J. Winter, "Widowed mothers and mutual aid in early-Victorian Britain",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17(1983), pp. 1118-22.

<sup>21</sup> <sup>43</sup> Eric Hopkins,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1815-1945*,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9, p. 142. p. 185.

<sup>22</sup> Eric Hopkins, *Working-class Self-help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London: UCL Press, 1995, p. 10.

作者简介:郭家宏,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100875

〔责任编辑:姜守明〕